

文献与方法：后文革写作及其研究

钟怡雯*

元智大学中语系

摘要

本论文概述在中国政治气氛变化下，“后文革”的研究文献和非虚构写作现状，以及文革对知识份子的生命史与心灵史的影响。散文以其非虚构的书写特质，可以呈现这种特性，以其非官方、多元的民间史观，留下多元的民间集体记忆，也因此具有跟中共官方历史对话或对抗的功能，包括（1）知识份子和文人以散文、杂文、自传、回忆录、日记等非虚构文体写作的苦难主题；（2）知青作家带着“追忆逝水年华”的怀旧书写；（3）文革除了政治活动，尚有呈现庶民日常的小历史写作，其中包含女性重视细节的文革书写。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非虚构写作，集体记忆，知青

* 钟怡雯，博士，元智大学中语系教授。

Reference and Method: Post Cultural Revolution Writing and Research

CHOONG Yee Voon

Chinese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post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non-fiction writing under the changing political climate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life and spiritu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Based on its non-fiction characteristic, prose is able to present an unofficial and pluralistic folk's view of history, in conversation and confrontation with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to rewrite the literary history.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 more pluralistic folk's collective memory will be highly concerned in this study. Three dimensions are included: (1) Writings of sufferings in the form of prose, essay, autobiography, diary and memoirs based on intellectuals and literati. (2) Intellectual youth writer with "Remembrance of Lost Time" style of nostalgia writing. (3) Besides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re're minor history writing on civilian life of common people during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female writings which focus on minutiae.

Key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on-fiction Writing, Collective Memory, Intellectual youth

《中国共产党简史》（简称《简史》）于 2021 年 2 月出版，这是继 2001 年及 2010 年后，中共第三次沿用同样的书名出版此书。《简史》是中共党史教材，记录了中共的百年历史，特别是 2021 年正值中共建党百年，因此有着决定性的指标作用。第三版《简史》简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淡化了毛泽东的错误，释放出为文革翻案的信号。¹ 2021 年 11 月 8-12 日，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习近平把邓小平的第二个决议里形容文革的“沉痛教训”改为“宝贵经验”，混淆“教训”和“经验”的界限，用“探索”和“曲折”等字眼来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所造成的文革政治灾难开脱。它利用文革时期的科技和经济的“伟大成就”，来模糊政治灾难和经济损失。新的宣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 30 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取得旧中国几千年所没有过的进步。曾经两度系狱的旅美学者宋永毅（1949-）表达了沉痛的批判，他指出中国已有“不准再拿文革说事”、“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说法，习近平并且开始已干预学术。² 事实上，早在三年前，中国学术界已经不再刊登批判文革的论文，文革跟新疆一样成为敏感议题。英国 BBC、法国等多家媒体均报导了中国政治氛围的转变，法国的《哲学杂志》（Philosophie Magazine 网路版，2020/9/9）便以〈中国再现专政独裁〉（“La Chine Réinvente la Dictature”）为题，批判中共想

¹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简史》共 10 章，70 节，约 28 万字。习近平上任后近十年的历史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认为该书“是为文革翻案”，是习近平对文革复辟的进行式。详见王允：〈专访宋永毅：习版《中共简史》是为文革翻案〉，《自由亚洲电台》（2021/05/19），<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wy-05182021102012.html>，检索日期：2022/02/01。

² 宋永毅是著名的文革研究学者，他接受访问时表示，尽管家庭出身不好，但他与同时代人一样，曾诚心诚意拥护过毛泽东和共产党，并曾渴望成为一名导弹设计师，报效祖国。然而，文革爆发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乱象，让他开始质疑和思考毛所发动的这场运动和中国的未来。由于卷入文革中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宋永毅被同学举报，二十出头就被关押五年半。1989 年，宋永毅赴美国留学，后来定居洛杉矶，现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1998 至 2016 年前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五个数据库。与同行们一起完成《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相关资料见罗四鸽：〈习近平已经进入“毛晚期”——文革史学家宋永毅专访〉，《BBC 中文网》（2021/12/21），<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9679924>，检索日期：2022/02/01。

要重回毛时代。“文革在中国, 文革学在外国”的说法, 很不幸的, 恐怕将再次成为事实。³

刘青峰〈对历史的再发问〉(1996)对文革有以下回忆:“30年前, 文革爆发时我正是文革发源地北京大学的低年级学生, 曾亲眼目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饭厅外墙张贴。时至今日, 只要一闭上眼睛, 当年的惊涛骇浪就会澎湃脑际。”⁴聂元梓(1921-2019)是文革初期的“五大领袖”之首, 她所贴的大字报后来被毛泽东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⁵这张大字报发表后, 对“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煽动作用。从此, 文革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 翻新了中国的现代史, 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刘青峰又说:“文革改变了我和我这一代人的生道路。正是由文革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迫使我们这一代人从对现实发问迅速转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问。这一转向, 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 仍可以算作是继续文革时期的思考。”⁶刘青峰指出文革影响至深至远, 改变一代知识份子的思考和学术道路, 她后来跟夫婿金观涛等同辈人挹注毕生精力, 重新思考和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写下很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文化大革命(1966-1976)距今已近半个世纪, 然而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 刘青峰的理解是, 历经文革的一代人今天所从事的学术研究, 仍可以算作是继续文革时期的思考。刘青峰的见解很具启发性, 文革已逝, 影响长存, 文革的影响和评价在今天仍属于进行式, 因此文革的研究永远只能是阶段性的。苦难的经验, 翻天覆地的历史, 只能在未来彰显出它的意义。

刘青峰把文革经历转化为对学术的动力, 她所主编的《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1996)包含文革事实的再发现、革命运动与异端思潮、文革对世界的冲击、文学艺术中的文革以及评论与综述等 39 篇论述, 既有史料, 也有论文; 收入的论文除了中国的学者专家, 尚包含法国、日本、德国、美国等等研究文革学者的中译论文, 中外观点俱陈, 同时也说明, 文革的主战场固然在中国, 它的

³ 刘青峰:〈编者前言: 对历史的再发问〉,《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香港: 中文大学, 1996), 页 vii。

⁴ 刘青峰:〈编者前言: 对历史的再发问〉, 页 viii。

⁵ 详见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聂元梓回忆录》(香港: 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7), 此书初版于 2005 年, 由聂口述, 未经她本人审定。2017 年版本则由聂本人再修订增补, 评价两极。

⁶ 刘青峰:《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1996) viii。

影响却是世界性的。在学术研究上，文革是一个具跨域跨时代的主题；在政治上，1960年代中期以后，向世界输出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是中共的目标。⁷

毛泽东曾对他的追随者承诺，文革的目标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8/19），文革发生后，影响回流法国，法国昂热大学（Université d'Angers）的历史学教授 François Hourmant 的最新著作《68年五月风暴之前，当和之后的法国毛时代》（*Les Années Mao en France: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Mai 68*, 2018）分析文革对法国所造成的影响，名单中即有沙特（Jean Paul Sartre）、傅柯（Michel Foucault）、高达（Jean-Luc Godard）、马尔罗（Georges André Malraux）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德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亦受文革启示，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1982）推出“文化革命”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激烈冲突具有普世意义，这种方式对整个人类历史可以产生不断的，持久的文化革命史，文化革命为了保持永久的主导地位，必须不间断的斗争，同时伴随着那些拒绝同化，寻求支持的旧的或新的生产方式在结构式系统的对抗。⁸

詹姆逊的观点也可以延伸到文学史上。真正的革命不是定时事件，而是在革命以前就发生了，延安生活文学对文学的影响，将是持久的文学史议题。早在文革以前，延安文学（1935-1948）可视为文革文学的前哨。尚保有“文学性”的延安文学背后，其实已有无数日常斗争和阶级分化已经浮出地表。其后，是文学性每况愈下的十七年时期，其中包含以颂歌为写作特征的文革文学。五四的文学革命，一变而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文学。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某种意义上，仍是强烈的对政治的回应，或作为政治的附庸。反思、大墙或知青文学，也仍然是文学史对文革的回响，这也意味着，文学史势必不断回应文革。写作量最大，作品最厚实的中国 50 后作家，文革时正处于青少年，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百百种，他们错过了正规教育，孕育了独一无二的知青文学，然而上山下乡之后返城的遭遇和失落，所付出的代价难以评量。陈思和把文革后的文学史走向解释为

⁷ 相关讨论见参考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94期），<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93-mcs-2006-issue-3/972-2012-01-05-15-35-10.html>，检索日期：2022/02/02。此外，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以及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两书均提及共产党及文革对马新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⁸ 弗德雷里克·詹姆逊着，王振逢、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页83-85。

“还原民间”（1994），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促使他们反思土地与文化，寻根文学便是最好的结晶，它对比的是五四知识份子的精英意识形态。民间文化从五四新文化传统以来一直处于被压抑的隐形状态，然而在多元的、甚至藏污纳垢的民间生活之后，这种经历转化为创作养份，陈思和由此发展出民间写作的观点，重新诠释新时期以来的写作。⁹至于他们的上一辈，从五四走来的作家和学者，则是历经抗战、国共内战，迎来新中国之后，人生观和价值判断再次接受颠覆与洗礼。“文革一代人”这个概念底下的写作者和知识份子，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文革经验是形成台湾和大陆在写作主题和风格分水岭的关键之一，而且是昂贵而沉痛的写作资产，百年一遇。王尧在〈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2002）则更进一步，把文革上溯五四精神，下及 1980 年以后的文化反思。这篇长达 41 页的宏文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在文学界引发了热烈的回响，有左翼学者把文革视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当时文化界把文革与五四联系起来，引发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的热烈讨论。¹⁰1980、90 年代的文化反思与人文精神的论述热潮，可说是文革所引发的时代症状。

文革史写作与研究在华人世界的开端，应该是在 1980 年代中期。六四后流亡法国的中国学者严家其（1942-）、高皋（？）夫妻合着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下）》（1986）可说是最早的文革史重量级著作，原版长达 752 页，当时由天津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超过 100 万册（在那个年代属于畅销书，此书 1990 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印行）。全书记述了文革期间所有的重大事件，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读者都是先从此书开始了解文革史。严家其同时期写成的《首脑论》（1986）从政治权力的角度展开论述，反思作为首脑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质，是为中国首脑政治学的先河。如同刘青峰所言，文革让他们重新反思中国的传统和历史。文革开始时，严家其二十四岁，文革结束，他三十四，正逢思想的形塑期，人生的黄金十年。日后严家其当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智囊，推动政治改革。六四时他支持民运，而后流亡法国，再移民美国，无论在学术取向或现实人生的选择，均可视为文革的遗绪。

刘青峰 1996 年的观察至今已过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到 2019 年之间，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政治氛围下，文革研究已经累积了一丰富的论

⁹ 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 年 01 期），页 53-61。

¹⁰ 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 1 期，页 61-102。后来引发的讨论，具体的可参考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 4 期，页 56-65。

述成果，定宜庄、刘小萌合着《中国知青史》两册是重要的知青研究资料。上册由定宜庄（1948-）着《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1998），下册《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1998）则由刘小萌（1952-）执笔。两位学者都是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均当过知青，知青研究最早始于 1990 年代，他们是先行者，出版过《中国知青事典》（定宜庄、刘小萌、史卫民、何岚合着，1995），《中国知青史》之后，刘小萌又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2004）。

《中国知青史》根据官方文献档案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分析和叙述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主要重点有三：第一，知青上山除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考量，更与建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紧密相关，是各种政策施行造成的结果。第二，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主要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无论作为一项安置工作，还是以后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运行机制上，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采取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做法。第三，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明确区分知青。狭义的知青特指 1962 年后从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及其以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是知青的主体。正如《老三届之歌》（作词：刘岐山；作曲：向邦瑜）所唱的，老三届是一千五百万人的共称，是承上启下坚韧的一代，身上承载过共和国历史的厚重。广义而言，知青还应包括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他们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

两册《中国知青史》用大量篇幅，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回乡知青群体与他们的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知青一代是文革重中之重，正当青年的他们日后成为国家的重要骨干，影响深远，也是 1980 年以后文化反思的带头人物。在文学史上，这一代更是重要的作家与学者。《中国知青史》叙述文革前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文革十年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衔接的两次高潮，“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知青的“政治冤案”以及知青觉悟的历程等主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文革结束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衰落的前因后果也有着墨。这两册书既是一部内容翔实的知青上山下乡史，也是了解文革的必要参考书。定宜庄指出，知青这一群体的产生，关键在于中共建政后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在 1950 年代，执政者的理念是打碎一个私有制的旧世界，于是在城市和乡村同时开展改造。在城市消灭私人工商业，而改造成“国营”；农村则进行土

地革命。1954 年宪法取消了人口自由迁徙权的规定,《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实行,严格规定农村户口的学生考城市中学的比例,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些规定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在这个制度下,城镇户口的居民享有升学、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的诸多福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也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产生的,它的根本特征,就是首先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户籍地。当城市的经济出现问题时,再让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所以,成为知青就意味着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放弃城市户口所享有的一系列福利和权利。1962 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包括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成了知青的主体。定宜庄认为,这是一场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运动。定宜庄和刘小萌在访谈中表示,知青时他们都曾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原以为草原很浪漫,可是现实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生活艰苦,卫生条件不好,浑身长满了虱子。后来慢慢习惯了,知青们就把虱子称为“革命小虫”。在草原插队的五年里,刘小萌和很多知青一起放羊,每天与狼群同行。¹¹

根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的说法,其实早在文革开始前的 1962-1966 年,已经有近 130 万青年下乡或回乡,这是文革的“初澜”,原来只是解决城市就业人口的方式之一,下乡的人仍有选择权,随之而来的十年则是真正的文革“高潮”,以强制的手段“一锅端”、“一刀切”,“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跟“忠不忠于毛主席”划上等号,再推进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高度政治化议题,最后整个国家与社会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家庭四散,引发一连串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北岛(1949-)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城门开》(2010-)提到,文革时一家五口离开北京老家分散各地,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一九六九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五个地方。”¹²三兄妹都曾因营养不良而生病,妹妹后来下放襄樊(即襄阳),因游泳救人而溺毙,母亲因此精神崩溃。这是千百万个故事中的其中一个,还不是最悲惨的。另一位朦胧诗人舒婷(1952-)曾经辍学在闽西山区插队三年(1969-1972),返回厦门后当了八年工人,《一代人的呼声》(1980)有

¹¹ 《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愿知青运动永不再发生,《凤凰网资讯》(2009/10/19),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iquing/mingrenlu/200910/1019_6855_1394287.shtml, 检索日期:2022/02/02。

¹² 北岛:《城门开》(香港:牛津大学,2010),页 191。

以下表达：“我绝不申诉 / 我个人的不幸 / 错过的青春 / 变形的灵魂 / 无数失眠之夜 / 留下来痛苦的记忆 / 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 / 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 / 心中只剩下 / 一片触目的废墟……。”¹³撇开诗艺不论，我们可以从这首诗了解知青的遭遇和伤害。舒婷在十七岁插队，历经了三年知青的劳动生活，当了八年工人之后，二十八岁写下这首诗。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却抵押给了国家机器。舒婷的经历不是个案，而是一代人的青春缩影。上山下乡囚禁了一代人的青春，他们的挣扎和迷惑，被时代扭曲的灵魂，幸运的可以化为文字流传于世，大部份则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¹⁴清代诗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场百年一遇的政治运动成为文学史的遗产，知青却以青春和生命承担了历史的苦果。

根据长期研究文革的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 1949-）《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2009）的观点，文革写作、访谈等纪实文学从1990开始大量增加，中共当局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甚至出第一本书或第一个展览都可获得官方的赞助与支持，潘鸣啸认为这是为了对1989年血腥镇压而作的补偿，因此出版品与电影猛然增加，“到1998年运动30周年时达到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村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余、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像册及电视片集”¹⁵。1970年代中期潘鸣啸即在中国采集资料，在农村做过大量田野调查，走访了数不清的中国知青。后来也采访过张承志、阿城、张抗抗、北岛、芒克、梁晓声等作家。他目前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当代史研究员，学生时代的潘鸣啸坚信马克思主义、崇拜毛泽东，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十九岁的潘鸣啸是支持左派的造反派学生，这样的背景让他对文革很感兴趣，曾出版《二十岁在中国》（*Vingt Ans en Chine*, 2004）。他用“失落的一代”来形容知青的际遇，他们正是要受教育的年龄，却将青春失落在戈壁、荒野和农村，回城后好不容易谋得工作，又在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中纷纷落马。更可怜的是那些在

¹³ 舒婷：《舒婷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页43。

¹⁴ 刘小萌指出，大批青年下放农村，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多数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均有困难。失去教育机会，文化生活贫乏，被迫中断学业，在名为再教育的过程中，原来学习的知识退化。下乡的人权没有获得保障，农村的艰苦环境也不是城市青年可以适应的，不少青年因意外事故或患病没有获得及时的医治，繁重的劳动、营养不良而罹病的青年不可胜数。文革之后，下乡青年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各方面都缺乏竞争力。下放对青年的家庭也造成影响。当时有人把上山下乡的政策名为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然而，知青确实也对建设农村，开发边疆有所贡献，虽然那是以千百万人命运蹉跎的代价。详参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页15-21。

¹⁵ 潘鸣啸着、欧阳茵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2009），页xxiii-xxiv。

“不怕苦, 不怕死”的精神号召下开荒, 因此而失去一条腿或一只胳膊, 落下残疾的知青, 他们尚未及完全盛放的生命就此萎顿。文革的论文则首推金大陆等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中、下)》(2009)三册是重要的文革资料, 从 1980、1990 到 2000, 三个十年, 按年代汇集各方研究知青的论述和史料, 完整呈现知青上山下乡史以及心灵史。金大陆是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 是文革研究的专业, 上海是经济中心, 也是文革的“策源地”, 重要事件的发生地, 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 可以说, 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¹⁶, 以及“一月革命风暴”等¹⁷, 因此金大陆的研究可说具有地理位置上的意义。北岛等编《暴风雨的记忆: 1965-1971 年的北京四中》(2011), 收入四中同学牟志京〈似水流年〉一文, 此文提到, 1965 年后半年, 报刊开始刊登跟《海瑞罢官》相关的文章, “我饶有兴致读进去, 慢慢看出其中一方的蛮横, 心中不平起来。姚文元就是我当时最反感的笔杆子之一。”于是他在课堂作文里把这事大肆批判了一番, 成了众矢之的。一年后, 他碰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 遇罗克的结论是, 换成是他, 他绝不会写这样的文章, 因为这事是政治性的, 不是学术的。¹⁸以上这些从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各角度的资料和史实, 有助于叙述大时代的背景, 对文革的散文研究很有帮助。

无论是五四开始写作, 或者 50 后、60 后的作家, 也在 1990 年代之后累积了丰富的非虚构(non-fiction)写作, 包括自传、回忆录、杂文、日记等。这些纪实性的写作还原时代和现场, 建构文革的样貌。应该这样理解, 非虚构写作的涌现, 也进一步推动文革研究。见证文革的那代人已逐渐凋零, 却仍然有钱理群

¹⁶ 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1965/11/101)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时任上海芦湾区宣传部, 因此而声名大噪, 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也曾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第九及第十中共政委。1966/04/10, 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 1966/02/02-20, 由江青在上海邀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吴晗是明史专家,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于 1960 年完成京剧《海瑞罢官》, 呼应毛泽东刚正不阿, 直言敢谏, 以及讲真话等, 除了剧本, 他还写了几篇相关的杂文。由于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重视, 让江青找到机会打落水狗, 她找来姚文元写文章, 点明批判吴晗, 把事件扩及当时领导层面的政策问题, 捕风捉影的把吴晗冠上反党和反社会的帽子, 并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跟庐山会议上撤销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海瑞罢官》由此成为政治事件。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成为发动文革的导火线。

¹⁷ 又称为一月革命。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 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面夺权风暴, 获得毛泽东的赞扬, 因而导致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

¹⁸ 北岛、曹亚凡、维一等编《暴风雨的记忆: 1965-1971 年的北京四中》(香港: 牛津, 2011), 页 4-5。这本书是关于十八位北京四中的学生的回忆, 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身在暴风雨中心, 透过他们的记忆, 将暴风雨中的小历史留下, 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时代的大历史。通过这本书, 可以对那个年代有更为细节性的深入认识及理解。整整一代人毕生难忘, 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

（1939-）这样的重量级学者完成巨著《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2008）、《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下）》（2012）。文革发生时，钱理群三十岁，他见证了文革对个人与时代的影响，表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在场者与幸存者，同时也是民间思想者”，他说“文革的遗产并非一片废墟，文革中的民间思考就是一个被遮蔽、遗忘的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自觉要承续自鲁迅以来的“精神界战士”谱系。这三本书的写作距离文革结束已三十余年，再一次印证文革书写，或者具有份量的文革书写不在当下，而在文革之后。拉开时间和距离，经过沉淀，可以对个人和集体的历史有更深刻的思考。文革建构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追忆、反思、转化，由此鉴往知来，散文的非虚构写作特质，则有再现历史的功能。文革的历史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可作为散文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革期间的纪实散文作品极少，文革结束后，各方文人和诗人追忆文革的散文越来越多，佳作也不少，可是，相关的研究却非常贫乏。散文研究向来是长期被主流论述忽略的一块，研究成果几乎可说是空白的。许子东《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2000）、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2001）、周保欣《沉默的风景——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2004）、张景兰《行走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研究》（2008）等专书都是研究小说。诗歌研究则有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2004），散文的研究相对匮乏，大陆学者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2007）略有论及，不过此书论述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涵盖的文类也较多样，并不聚焦在散文。出生于广西，目前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学者王力坚《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2008）一书总共十二章，所论以知青小说为主，第十章“纪实与网路”则论及“纪实文学”和“网路文学”，是第一个把知青在网站发表的文章纳入的论述，取样广泛。王力坚曾经当过知青，他以自身经验为底气的论述，能见人所未见。单篇论文则有台湾学者陈器文〈广场上的替罪羊——中国文学中的歧异份子〉探讨文革造神运动下的替罪羊现象，文类以小说为主，纪实散文的取样较少；中国学者兼诗人阿海〈作为历史构成的“中国苦难文学”——兼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史文学”〉则是从苦难的角度论述非虚构的自传作品，如何以个人史颠覆中共的大历史，是极少数从散文的角度切入的论述，指出海外女性作家的个人史书写模式较男作家容易引起注意，譬如张戎的《鸿》（1991）、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神话〉（1980）、曾铮《静水深流》（2004）、虹影《饥饿的女儿》（1997）、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2007）等，并没有更一进步的作品讨论和分析（陈器文和

阿海的论文收入贝岭编《作为见证的文学》)。另外, 诗论也只有陈大为〈小历史写作——文革地下诗歌的史料建构与编织〉。

从文类来看, 文革主题写作最早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和诗, 非虚构文体, 即广义的散文, 包括杂文、自传、回忆录、日记等则相对零星。文革结束后, 最早出现也最有份量的杂文是巴金(1904-2005)《随想录》(1978/12/1-1986/8/20, 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与《无题集》五集, 以第一集《随想录》为名, 1980-1986 年陆续由三联书店出齐)。他在香港《大公报》以“随想录”之名写专栏, 总共发表了 150 篇杂文, 后来结集成五册文集。文革时期, 巴金以六十二岁之龄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检查、批斗和强迫劳动没少过, 各种劳动包括抬粪、种菜、喂猪等重活儿都做过。他过往的文学成就成了他的罪状, 妻子萧珊也遭牵连受批, 1972 年癌逝。巴金在《随想录》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 坦承文革让自己人格出现扭曲, 他把文革定位为十年浩劫,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随想录》是他在晚年完成的“忏悔录”, 文体独树一帜, 虽是杂文, 却有西方自传源自基督教的“忏悔”和“自剖”特质, 巴金剖开的是他的灵魂, 以及文革血泪斑斑的历史。

文革散文的成果斐然, 重要的类型包括:

(一) 知识份子和文人的“文革忆旧”: 重要选集有北岛和李陀编《七十年代》(2008)、刘禾编《持灯的使者》(2001)、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1999)、徐友渔编《1996: 我们那代的回忆》(1998), 更早的则有吴氓等《敢有歌吟动地哀——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青年诗选》(1974), 是诗与文的混选。至于“今天派”的部分, 则选自《今天杂志》的专栏稿件。《持灯的使者》收入是原刊于《今天·今天旧话》专栏的十二篇回忆散文, 再从《沉沦的圣殿》挑选四篇散文和八篇访谈集结成书, 以“忆旧/重写”为目的, 重估白洋淀诗群和诗人食指, 他们“追忆”的感性叙事, 以细节和轶闻重写/补白文学史, 一改文革书写的苦难主流叙事。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则从知识份子史的角度试图重构一个时代, 邀请散居全球的学者和作家追忆七十年代, 这本书是李陀编《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论文集的姐妹之作, 作品和论文齐下, 重写文学史的意图非常明显。

(二) 自传体散文: 个集数量庞大, 除了巴金的《随想录》,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2004) 等四本散文集、郑念《上海生与死》(1987)、杨绛《我

们仨》（2004）及《干校六记》（1981）、巫宁坤《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2007）和《孤琴》（2008）、康正果《出中国记》（2005）、季羨林《牛棚杂忆》（1998）、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2001）、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2006）、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2005）、曹冠龙《阁楼上下》（1993）等。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散文里尚包括台湾作家陈若曦。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她以台湾人的身份曾赴大陆参与那段历史，除了在1970年代完成《文革杂忆》（1978）之外，后又出版散文《坚持·无悔》（2011）重忆当年，从书名可约略窥见其立场。

（三）日记和书信体：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的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个案。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就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只有事实，还有心灵轨迹。吴宓生前对自己日记的价值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1957年他曾萌生写自传的念头，认为自传可以和诗集及历年日记相辅而行，“虽记私人生活事实，亦即此时代中国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虽以自己为线索，其书之内容实有可传之价值，而人之读之者，必亦觉其亲切有味也。”其他譬如徐晓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1999）、《民间书信》（2000）等，遇罗克的遗作和日记的重新出版，以及同代人从不同角度回忆写《出身论》（1968）的遇罗克，还原当年“现行反革命”典型人物的历史境遇。陈焕仁《红卫兵日记》（2006）以日记整理而成，长达八百余页，被研究文革的学者视为“文革社会生活的具体真实生动的实录”。书信重要的则有沉从文《沉从文家书》（2012）等。

若以主题粗略划分，文革相关的非虚构写作可分为：

（一）苦难叙述：知识份子和文人以散文、杂文、自传、回忆录、日记等非虚构文体写作的苦难主题。

（二）知青作家的忆旧：近十几年来，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以“追忆逝水年华”的笔调，怀旧式的叙述累积了可观的作品。这类散文叙述的不尽然全是苦难，包括韩少功等诸多创作者皆开始这类写作。

(三) 小历史写作: 藉由民间的小历史写作, 其中包含了女性的文革书写所呈现的庶民日常, 重视生活和细节的特色, 这在当前的论述中相对匮乏, 女性视角可以补白当前文学史叙述的阙漏。

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 都可能对文革有不同的“我见”。这些不同的“我见”将互为文本, 各自诉说, 指向一个充满激情、苦难的时代, 呈现非官方、多元的民间史观。散文以有实而为纪, 所纪“故”事 (past event), 本身便是“故事” (story), 这样记述或叙述具有历史的功能。这些文革书写, 可视为众多加“s”的小写 history, 乃至 her-story (杨绛、章诒和、郑念、张抗抗、张戎等的散文都具有女性视角), 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和观点, 提供跟官方历史, 也就是大写的 History 对话 / 对抗的可能。散文写作不在探查历史的真相, 亦非再现“真实”, 而是试图呈现一个波涛起伏的时代是如何被叙述, 叙述的方式及目的为何。这些文革叙述交织成另一种历史, 让历史以文学的方式被陈述, 绘制一代人的情感、精神和生活面貌。

文革对写作者的心理和精神的影响, 以及写作美学上的转折, 也十分值得关注。这项研究应该兼顾当时知识份子的精神状态。复杂的政治对写作者、知识份子造成冲击, 当然也影响了它的艺术性表现。延安散文的重要变革在语言, 带有政治性和庶民性的“革命白话”取代了五四运动初期的“白话革命”, 中共建政后扩展到整个中国。“革命白话”对散文在艺术技巧、修辞、言语的精致度方面, 产生立即性的破坏, 甚至在大部分延安作家或文坛新锐手里, 明显出现艺术水平的“降格”, 但在一批文坛大家的手里, 他们将“革命白话”调节到既可深入庶民的阅读领域, 又不致于败掉散文作为一种文类 (而不是政治宣传文字) 的格调。从正面效益来看, 延安散文的“革命白话”之路, 迫使出身菁英文化阶层的作家, 卸下知识份子的身份和自我意识, 深入民间, 更参与了战争苦难、边区人民生活、各省人文地理, 大大开拓了写作主题的层面, 为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的再崛起, 累积了大量的写作资本。“革命白话”所倡导的语言庶民化, 经过近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生命沉潜, 在作家卷土重来之际, 更能够袒诚、赤裸的切入自传体散文的内部, 转化成一种洗尽铅华、质朴的生命力。从延安以降, 中国作家的写作美学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 它是两岸文学风格和语言裂变的第一个关键, 文革则是再一次写作和精神上的双重清洗。因此, 写作者心理的转向、语言风格的阶段性调整、以及自我意识与大时代的对话, 都是值得深究之处。文革不能被美化, 历史不能被修改, 文革散文非虚构写作兼有的纪史功能, 为时代留下记忆, 正是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北岛、曹亚凡、维一等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1 年的北京四中》，香港：牛津，2011 年。
- 北岛：《城门开》，香港：牛津大学，2010 年。
- 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 4 期，页 56-65。
- 陈思和：〈民间的还原 ——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 年第 1 期，页 53-61。
- 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 3 期（总第 94 期），<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93-mcs-2006-issue-3/972-2012-01-05-15-35-10.html>
- 弗德雷里克·詹姆逊着，王振逢、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
- 刘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1996 年。
- 罗四鸽：〈习近平已经进入“毛晚期”——文革史学家宋永毅专访〉，《BBC 中文网》（2021/12/21），<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9679924>，检索日期：2022/02/01。
- 潘鸣啸着、欧阳茵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2009 年。
- 舒婷：《舒婷的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
- 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 年第 1 期，页 61-102。
- 王允：〈专访宋永毅：习版《中共简史》是为文革翻案〉，《自由亚洲电台》（2021/05/19），<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wy-05182021102012.html>，检索日期：2022/02/01。
- 〈《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愿知青运动永不再发生〉，《凤凰网资讯》（2009/10/19），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mingrenlu/200910/1019_6855_1394287.shtml，检索日期：2022/02/02。